

福建文学创作丛书

马宁

落户的喜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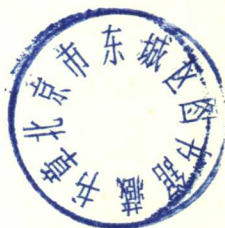


马 宁

90065529

落户的喜剧

I247.7
352.1



福建人民出版社

GBT77/10

落 户 的 喜 剧

马 宁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4.8888印张 2插页 73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770

书号: 10173·476 定价: 0.58元

我是怎样写起 小说来的（代序）

我生长于闽西贫困、落后的山区农村。

我的父亲是个贫佃农。我出生时他是个长途挑夫。父亲因为我们家上几代都是文盲，到我五岁的时候，便送我进私塾读书。私塾就在我家附近，走几分钟就到。我的启蒙老师叫黄添桂，因为我那时实足年龄不过四岁，对他的印象不深；但我六岁时的私塾老师黄映五，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是乡里闻名的“纸牌仙”，正业是赌博，副业才是教书。冬季，他怀里搂个火笼，伏在讲桌上打瞌睡，呼噜呼噜直响；夏季他脱下长袍捕捉虱子，抓一个掐一个，但抓不上几个，他又打呼噜了。他瘦得一阵风能把他吹倒，但他打的呼噜能把屋顶的瓦

片震得沙沙响，就是老天打几声雷，他也照睡不醒。每逢大雨过后，天井里积水成塘，我们趁着他瞌睡不醒，便叠制纸船，把蟑螂、蚂蚁放在船上，任它们乘着纸船漂荡，大家乐得把日日都要诵读的《三字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九二六年我由厦门集美师范部补习班升上一年级时，因为语文科稍优于同班同学，这一科便被提升一个年段上课。这是校董陈嘉庚奖励学生的一种措施。我本是师范部第二十一组的学生，但语文课升到上一年段的第十八组上课。十八组的语文老师出身于天津南开大学文科。他出的第一个作文题是：《童年的回忆》。我便写了这一段的私塾生活。下星期发回卷子的时候，老师头一个便叫我的名字，我原认为是自己的作文闯下了祸，正在发抖，老师却笑道：

“你把这篇作文贴在墙上，让大家看看！”

我接过作文本，只见文后老师批了八个红字：“笔若游龙，无施不可。”

我现在已记不起这位老师的姓名了，但他

的八个字批语，却鼓励我努力学习写作。不久以后，我们在地下党同学的领导下，掀起欢迎国民革命军入闽的革命学潮。因为我的语文科升了一个年段上课，便有两个年段的同学投我的票，我以多数票当选为集美学校八个学生代表之一。然而，斗争失败了。我们八个学生代表都被学校当局革除了学籍。为了平息反对开除学生代表的更大规模的学潮，学校当局便宣布提前两个月放暑假，并以停膳办法胁迫学生离校。我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恰巧读到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的《革命与文学》一文，也就有当一名文艺小兵的念头了。从这时候起，文艺书籍总是不离手，从林纾译的《茶花女轶事》到路卜洵的《灰色马》、都德的《小物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从《红楼梦》、《水浒传》到《七侠五义》、《岳飞传》；我还把谢冰心译的泰戈尔的诗集都朗诵过，习写了第一首诗：“窗前的啼鸟呀，你是不是把我从梦中叫醒的那一个？”

我开始了流浪生活。我到汕头当了国民革命军的学运宣传员，读到蒋光慈的《少年漂泊

者》，受到极大的冲击；接着读到刚刚出版的《未名》上介绍罗曼·罗兰的文章，就决心要向文学进军了。

一九二七年我到上海去找郭沫若，以为找到革命作家便能找到真理。可是，郭沫若那时不在上海，没有见到郭沫若，却在闸北一条又脏又窄的小街道上找到创造社门市部，认识了店里唯一的店员丘韵铎。他鼓励我去投考有革命学生大本营之称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挂名，实际领导人是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文学院院长陈望道、著名作家教授沈雁冰等人。那时我已读过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他甚是崇拜，便去报考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试题是：《试论中国文坛之趋势》。我依据《革命与文学》一文的思想作文，在文中言：只谈风花雪月，专讲幽默不足以唤醒人民群众。我侥幸被录取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下学期插班生。这思想上的飞跃，使我跟革命师生一道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蒋介石不费一弹进入上海市区后不久，就背叛了国民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上海大学被封闭，我被赶出了校门，踏上了社会大学。这血洗的教训，迫使我决心尽速投入革命文学的道路。这样，我便开始了小说创作。大约这是年的秋初，我便写出两篇讥嘲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的短篇小说，一篇叫《古月博士》，一篇叫《教务长》。^①我把这两篇习作寄给创造社编辑部，得到王独清署名的回信，信里说：“假如你沿着你选择的道路奋斗下去，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人民作家。”王独清虽然后来走向他自己的反面，但当时他那一封信却确实鼓舞我在革命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蒋介石出卖了国民革命，中国大地又暗无天日了。首先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惨景不时涌现在我的脑际。我不能忘记故乡的父老。这样，我便写出《廉价之马》、《田中的喜剧》，通过黄南英、缺嘴、土钵这样的形象，寄托我的同情与愤慨。但是，黄南英、缺嘴与土钵他们的悲剧不能再演下去了，我也不能在原地踏步。因而，我便要“冲出书斋，扩充眼界”，

^①《古月博士》、《教务长》刊登于马来亚《槟城新闻》，1931年某月某日，尚未找到。

“我要跳身在时代的奔波，我要跳身在事变的车轮！”“要把全人类的苦乐都堆积在我寸心，我的小我便扩大成全人类的大我，我便和全人类一样，最后终归消磨。”①

我决定象浮士德博士那样，出门追求真理。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事件发生后，我逆江而上，直至南昌暴动旧址南昌大旅社。我原以为到了南昌，就可能找到上井冈山的路。虽然此行不能如愿以偿，但我在日轮上碰见的一个日本水手的悲惨遭遇（“五卅”惨案夺走了他爱恋的上海码头姑娘，他因悲愤而致痴癫），却使我认识了日本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而，在党的生日那一天，我在南昌大旅社写出《船上人》篇。

朱毛红军入闽，在我的故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而在上海，蒋介石屠杀人民的枪声却日有所闻。上海报刊登出惊人的新闻：龙华枪声一响，流浪上海市区的饿犬便会飞奔而去饱餐人肉。我以万分愤怒的激情写出了《挨饿阶级的狗们》。

我回到红色故乡。我在闽西山村游击区亲

①见郭沫若译《浮士德》。

眼看到翻身的工农兵能自编自演革命山歌戏，因而我认为：只须工农兵掌握了政权，中国一定会出现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本的无产阶级文学。我即写了一篇通讯寄去上海发表，阐述了我的这种见解。这篇通讯发表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的五个月，即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在这篇通讯上，我宣称中国苏维埃区是在“新的太阳照耀下”。四个月后的即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我参加了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我在一九二六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我没有离开过作为一个左翼作家的战斗岗位。

我写的短篇小说不多，总共不上三十篇，多半发表在海外的报刊上。由于太平洋战争，早已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下，至今一篇也没有找到。我现在已找到的是在国内和香港出版的中长篇小说八部，四幕剧一部，短篇小说十篇。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十篇，是从一九二九——一九六三年的短篇中选出来的，按发表年代顺序排列，可以让读者了解我走过的道路。

在这里，我应当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

伊同志和省人民出版社文艺室的同志，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极为细致的工作。

马 宁

1983年1月25日

于福州市怀恩斋

目
录

廉价之马	• 1 •
挨饿阶级的狗们	• 25 •
西伯利亚	• 36 •
船上人	• 55 •
田中的喜剧	• 73 •
当胜利到来的时候	• 85 •
不挂牌的医生	• 97 •
武夷山上的白蝴蝶	• 109 •
“老规矩”	• 125 •
落户的喜剧	• 136 •

廉 价 之 马

挣扎，挣扎，呼，呼……

黄南英坐在一辆货车上，逼着马在雪道上走，风雪声和车轮碾在雪道上的声音混和着，织入这永久的空幕：雄浑，悲哀，舞场里的歌声般，垂死人的叹息般，一声声，一声声……

天空沉郁着，哭泣着，缕缕的黑云在飘飞：经过天心，吹入天涯底，重重叠叠。雪风吹得更厉害了，吹上枯树梢，吹入黄南英的心里。雪花纷飞：飞，飞上青天，飞入云表，飞过雪峰，飞入幽谷，飞过野地，飞过麦田，飞上马身，飞入货车……

没有光，太阳已深躲，夜色渐渐地从四面升起。一切都埋在过去里面……

呼，呼，挣扎，挣扎，呼……

黄南英坐在一辆货车上，赶着马在雪道上走。马已经走得东歪西倒了，马身上满是雪花，马的耳朵里也满是雪花，马的身体震颤着，车也震颤着，黄南英的身体也震颤着。

黄南英是本地人，就是那个落花村里的一个货车夫。其实，这村里只有他自己做着这种生意。他和他的盲太太同住，家中没有第三个人，一个小孩也没有。他的家产很简单，就是一辆旧马车，一匹骨头突出的赤鬃花白尾的马，两只小鸡（这是养着过年用的），一只癞狗和一只常在外面走的小猫（它常常和狗纠缠着胡闹，有时候把南英和盲太太从梦里惊醒）；还有一尊泥菩萨和一个炉子，一只大水缸，两个小房间，一间是卧房，一间是厨房（也就是收拾一切的杂物间）；马是从来都关在里面的那个圪厅里。至于车，那是自有天下以来便是放在门口的，不管是雨天或晴天。

他没有甚么交际，除了每天早上人家送东西来请他运到城里的店里去和晚上由店里替他们运东西回来以外。至于盲太太，那简直是个再忠心也没有的妻子。她终日坐在家里看守

着，提防着癞狗和猫打架；中午和下半年拿粟米给两只小鸡吃。三餐呢，那早上照例是归南英做；如果米多的话，那他就做两餐的饭，连中午盲太太在家吃的饭也一起做好；如果米不够时，那她就要挨着饿，一直到他由城里买着米回来之后。他回来之后，照例先洗脚，然后，就在房子里巡视一周，接着就赶那两只小鸡入笼子里去，紧关着，不让老鼠和黄鼠狼捉去。盲太太便照例生火，煮饭。她不独晓得怎样生火，而且晓得发出什么声音表示饭做好了。至于菜，那从来是由城里买现成的，无非是乳豆腐和咸菜之类。有时候，南英也买点熟河鱼和熟牛肝之类，这算是特别餐，是罕有的。他俩的生活，在他俩以为是很可以，而且很安适。盲太太如果有熟河鱼和牛肝吃的时候，那简直就要快活得打喷嚏。这无非是因为她的盲目不能看见别人吃猪肉和生鱼炖香菰之类的缘故。

落花村，本来也就不大，只住上十多户人家，而且都是耕田的。然而，耕田的事大概是归女人做，男人大都在城里开杂货店，同时也就出卖家里的出产。黄南英在他们的眼里并不

怎样重要，除了每天照例给他们运货之外。然而，这落花村如果没有黄南英，那他们就一定不行了，因为在黄南英以外再不会有别人做这种营生的，所以也就觉得高人一等。如果有时候，人家嫌他运货运得太迟或者同他罗嗦的时候，他便拱起两手撑着腰，直挺挺地站着，想，“呸！如果我不替你们载东西，那你们的東西一步也跑不动。”他这思想错误与否，他不敢十分决断，不过，他自己却的确以为有十二分的理由；然而，只想而已，却不敢说出口。这点，就是他永久是个货车夫，永久是个黄南英的缘故。然而，他也常常想到未来，未来在他觉得颇不可思议，那就是这个思想：

“如果我死了，他们的东西不晓得靠什么人载运，他们此刻也想到没有？”他于是滴下几点眼泪，而且苦笑一下。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天也会老吧，不然，雪天怎会没有温暖的太阳呢。即使有，那也是冷的热，并没有夏天那么热，一副没有生气的样子。这也是黄南英的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关于人生，黄南英也自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然而，他并不晓得什么叫做“人生哲

学”，胡适之对此在《哲学史大纲》上也没有作解释，这实在是博士先生最大的错误。

一句话，生活的意义在黄南英看来，那就是赶马进城和赶马归家。天明出门，天晚回家。

呼，挣扎，挣扎，呼……

马愈走愈不行了，几乎要倒下来了。天已经黑了，差不多认不出哪里是路来了，如果不是有枯了的路树在震颤着指示他。雪风也吹得比先前厉害了，黄南英坐在货车上也格外地震颤起来。他使劲用鞭子抽打他的马，然而不行了，他的鞭子抽打得愈紧，马的步伐却愈慢了。

——啊，不行了，这马老了。

这马的确老了。他从来也没想到马会老这个问题，他以为马是不应该老的，因为，他是何等的怕他的马“老”呀！

马终于站住了，而且似乎要倒了。这把南英吓得沙沙地磨起牙齿来。他哆嗦着跳下车来，走到马的前面去；马对着他叹息。他扶起马头来，摸着它额前的鬃毛，马的两个眼睛睁着，显然是向他求情。他差不多要哭了。他抱